

乡土小说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中国风格

杨建军, 崔涛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新时代文学的乡土小说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但学界对其叙事风格的关注略有不足。通过梳理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发展流变, 分析小说叙事的中国风格, 研究发现: 新时代乡土小说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中国风格表现为在“中国套盒”叙事结构中融入“跨层表达”“跨体书写”和“互涵交迭”; 将农村外来者等人的限知视角与叙述者的全知视角结合, 形成叙事视角内外流动; 在风俗画和风景画的诗意描绘中, 营造具有乡愁意味的叙事氛围。新时代乡土小说叙事的中国风格, 可启发研究者从叙事时间、空间、伦理、观念和互文等方面思考如何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 推动新时代文学向“高峰”迈进。

关键词: 新时代文学; 乡土小说; 叙事风格; 山乡巨变; 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3-0219-11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建设历程中, 中国乡土文学的边界不断扩展, “底层写作”“亚乡土叙事”“新乡土文学”“新乡土写作”等被相继提出。近年来, 伴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成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风尚。2022年, 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文坛涌现了获茅盾文学奖的《雪山大地》《宝水》, 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在高原》《驻村笔记》《人间消息》和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上学谣》等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乡土小说佳作。在这一过程中, 研究者发现乡土小说既有的内涵外延、写作范式和功能使命等, 已不能较好地应对新时代乡土中国的变化^①。因此, 我们需要调整思维习惯, 从时代背景、乡土现状和文学语境的变迁出发, 深入思考乡土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

新时代文学, “是以创新为动力, 勇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的文学; 是坚定文化自信, 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1]。作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乡土小说“以新的叙事主题、乡村人物形象、伦理文化以及审美形式, 书写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乡村精神风貌”^[2], “是我们考察乡土中国现代转型以及农村现实状况的有效路径, 也是探究乡土文学新变的重要视角”^[3]。然而, 当前新时代乡土小说研究, 多关注文本内容的现代化叙事, 较少察觉叙事风格的本土化建构, 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传承创新关注不足。在“坚定文化自信, 持续挖掘和借鉴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4]的时代洪流中, 我们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新时代乡土小说。蔡仪认为, 风格是艺术作品因于内而符于外的风貌, “其随着用笔, 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运用等表现出来”^{[5](70)}。新时代乡土小说“秉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6], 探索新的美学格调, 构筑叙事的中国风格。本文关注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发展流变, 选取近十年来以“山乡巨变”

收稿日期: 2024-07-13; 修回日期: 2024-12-30

基金项目: 甘肃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023ZDWT08)

作者简介: 杨建军, 男, 甘肃天水人, 文学博士,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产业, 联系邮箱: yangjianjun@lzu.edu.cn; 崔涛, 男, 黑龙江鸡西人, 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为主题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通过分析叙事的中国风格,探讨如何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呈现新时代文学的新气象。

一、“中国套盒”的叙事结构

新时代文学,“不仅要在文学的思想内容层面进行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化与创新,而且要在文学的艺术形式层面进行中国文体传统的转化与创新”^[7]。新时代乡土小说多传承“中国套盒”式文体传统,在大故事中套入系列小故事,通过故事层套的“跨层表达”、文体连套的“跨体书写”、线索交套的“互涵交迭”等方式,建立大小故事之间的联系,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结构特征。

新时代乡土小说叙事,常以“中国套盒”结构系列乡村故事。赵毅衡认为,“中国套盒”原指“来自福建出口的一种玩具木器漆盒”^{[8](275)}。由之转化的“中国套盒”叙事结构,是指“一种故事里套故事——大故事里套着一个中故事,中故事里又套着一个小故事——的小说结构方式”^{[9](154)}。这种结构形式,由中国古典小说流传至今。“六朝志怪小说《阳羨书生》,还有我们熟知的《红楼梦》,都是典型的东方套盒叙事结构,都具备时间被压缩和凝结为场景、空间被传奇化和突变为情节的叙事特征。”^[10]鲁迅的《在酒楼上》、莫言的《酒国》和刘醒龙的《黄冈秘卷》等,也都具有这般特征。新时代乡土小说多选择创新“中国套盒”叙事结构,在作品中呈现出故事层套、文体连套与线索交套的新样貌。

故事层套,是指作品常通过叙述分层,将多个故事层层套连形成“中国套盒”。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宝水》,就是此种结构的典型例子。《宝水》因“山村生活的自然性决定了按照时序叙事成了必由之路”^[11],但也有故事层套的叙事结构,具体分为三个叙述层:第一叙述层是地青萍参与宝水村建设,第二叙述层是九奶与老原一家的情感纠葛,穿插其中的第三叙述层是地青萍重回乡土疗愈精神创伤。《宝水》的故事层套不仅展现了“宝水村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变”^[12]的叙事内容,还具有情感故事与乡村故事相互映衬的叙事风格。再如,老藤的《抬花轿》包括四个叙述层:齐大嘴当选村主任的经过是第一叙述层;“我”与齐大嘴带领村民致富为第二叙述层;在这之下,村民方世坤与石锁的明争暗斗是第三叙述层;此外,作者还套入方、石两家几十年恩怨的小故事,形成第四叙述层。两家的宿仇,看似与乡村脱贫无直接关联,却是第一叙述层中齐大嘴留在村子的原因。这种揭示农村历史现实问题的故事层套,还存在于红日的《码头》、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和蒋光成的《悬壶口》等中。如此套盒结构,使得新时代乡土小说围绕乡村建设层层套连了不同的乡村秩序与乡土情感,能够真切反映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殊“肌理”。为了增强不同故事层的套连黏性,作品常在故事层套中融入“跨层表达”。“不同层次的人物进入另一层次,从而使两个层次的叙述情节交织,这种情况,称作‘跨层’。”^{[13](76)}例如,乔洪涛《蝴蝶谷》中的白冰,原本是第一叙述层的人物,后跨入第三叙述层成为揭开革命秘密的关键力量,交代了沂蒙山区蝴蝶谷村贫困的人为因素;王松《热雪》中处于第一叙述层的张三宝,通过进入第二叙述层发现赵家坳的土地矛盾,观察该村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后,又回到第一叙述层完成创作乡村能人戏。可见,为探索农村贫困的根源,作家们有意重组时空,在故事层套的基础上引入“跨层表达”,意在发现农村故事内蕴的深层问题。如此“跨层”叙事,能套连小说各层人物关系网络,强化“中国套盒”的多维复合感,体现乡村建设的错综复杂性。

文体连套,是指小说在套盒结构中因不同文体融合使用而形成的“跨体书写”。文体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14](2)}。文体连套而成的“跨体书写”,常融合多种文体结构为作品主题服务。中国古代的唐传奇,就在“叙事中夹带大量诗词,这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引人瞩目

目的特点之一”^{[15](209)}。放眼当代文坛, 路遥、韩少功和莫言等创作的乡土小说, 也多有文体连套。新时代乡土小说常杂糅小说、散文、诗歌和日记等虚构性与非虚构性文体, 致力于多方面叙述新时代“山乡巨变”。温燕霞的《琵琶围》在各叙述层中嵌入歌谣和灯彩戏等民间说唱的韵文体, 每一处选用都隐含着作者的特殊用意。例如, 在第二叙述层解决脱贫难题时, 作者选用客家歌谣, 表明扶贫干部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 选用灯彩戏, 暗示诙谐的生活场景即将登场; 选用红色歌谣, 搭配农村革命故事。同时, 作者还在第一叙述层加入散文, 与小说体和韵文体等结合, 形成《琵琶围》的“跨体书写”。欧阳黔森在《莫道君行早》中, 发挥多年从事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优长, 在千年村“精准扶贫”的第一叙述层中, 穿插多种文体, 让作品贴近现实。忽培元也在《乡村第一书记》的两个叙述层中, 将日记体和公文文体相结合, 以追求心理视角与现实视角的融合。如此, 新时代乡土小说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文体连套中, 多角度地关注乡村建设的变化。

线索交套, 就是小说在套盒结构中采用不同故事线索交织而形成“互涵交迭”。“互涵交迭”表现为作品中各线索并列互补, 交替指向中心主题的美学形式。汉学家浦安迪认为, “中国的传统美学以‘互涵’(interrelated)与‘交迭’(overlapping)的观念为其关注的重点”^{[16](60)}。《儒林外史》便是典型的例子, 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线索, 每一叙述层讲述不同的儒林人物, 他们的活动形成互补, 交替指向讽刺社会腐朽的主题。新时代乡土小说叙事也多采用如此方法, 通过多个小故事线索交套的“互涵交迭”, 将多重时空统一在大故事的主旨表达中。如, 李明春《山盟》的第一叙述层讲述石家梁村的脱贫故事, 第二叙述层分为三个小故事, 一是石家三代接力共产党人的承诺; 二是第一书记帮助贫困户脱贫; 三是石老山夫妇守护革命秘密。三个小故事相对独立, 但故事线索“互涵交迭”于石家梁村“山乡巨变”的主题。王华的《大娄山》也是如此, 小说的第一叙述层讲述娄山县脱贫的统筹规划, 第二叙述层也分为三个故事, 即月亮村的易地搬迁、碧痕村的干群鱼水情和花河镇的整体提升, 三个小故事线索从村和镇等不同方面“互涵交迭”共同指向第一叙述层, 形成多侧面结合的立体化叙事结构。如此表达方式, 暗含的特殊意义在于, 让小说中乡村建设的多个小故事线索套连不同层面的人, “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 凝聚成一股力量, 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17], 进而表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容量和隐喻功能的构成”^{[18](151)}, 是小说叙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乡土小说在“中国套盒”结构中融合采用故事层套、文体连套、线索交套等叙事方式, 融合了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 有效探索了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的叙事结构。

二、内外流动的叙事视角

新时代乡土小说常以外来者和农村儿童的限知视角, 配合叙述者的全知视角, 形成视角内外流动的叙事特色。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就指出, 汉乐府诗、明清小说和鲁迅作品等都存在流动视角, “它们把从限知到达全知, 看作一个过程, 实现这个过程的方式就是视角的流动。把视角的流动贯通作为一个过程来处理, 这是与我们民族的认知心理结构具有对应之处的”^{[18](296)}。新时代乡土小说叙事视角的流动, 展现了动态观察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认知心理。

新时代乡土小说常以外来者的限知视角, 传达中国乡土文学的启蒙主题。有论者曾指出, 20世纪中国文学, “通过外来者与返乡者对故土和故国的观看与目视, 描述故土、故国和国民与现代和进步的巨大落差, 从而揭示作为被看对象的故乡与故国的‘落后’性、非现代性与无价值性, 说明其应该

被改造和替代的必要性”^{[19](57)}。从现代乡土文学的“侨寓者返乡”，到“十七年”文学的“工作队下乡”，再到知青文学的“知青下乡”等，一系列作品中的农村外来者大多承担着将现代文明传送到农村并启蒙农民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乡土文学的启蒙叙事，可以视为一种外来者关注农村的故事。新时代乡土小说同样如此。如在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中，扶贫干部李发康驻村后，看到村民发顺不思进取，宰杀扶贫猪，酗酒家暴成性。杨恩智的《普家河边》中的扶贫干部张德伟出现后，村“两委”不作为的问题浮出水面。

新时代乡土小说叙事没有止步于揭露问题，而是以外来者视角为基点形成流动视角，不仅有意展示农村的未知面，还着力反映农村的新改变。一方面，外来者视角与叙事者视角在不同层面流动，形成限知与全知的内外相交。外来者的限知视角，意在观察“山乡巨变”的细微过程；叙事者的全知视角，注重“山乡巨变”的整体进程。如，张艳荣的《繁花似锦》通过叙述者的全知视角讲述得胜村半个世纪的“山乡巨变”，其中组建“湿地蟹稻”联合会的过程，是通过第一书记范博成的视角讲述；向本贵的《上坡好个秋》通过扶贫干部张兴祥的视角引出刘生原的懒汉问题，又以全知视角反映基层工作的艰辛不易。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雪山大地》。杨志军通过作为沁多草原外来者的“父亲”的个人视角，展现藏地教育、商贸和生态等细节问题，通篇又以贯穿全文的全知视角呈现沁多草原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突出了藏民从生活方式到文化心态的现代化转变。“父亲”的限知视角不乏藏地发展的偶然性因素，如父亲下乡蹲点恰好遇到桑杰一家，去西宁探亲偶遇马福祿等。这些在生活中偶然接触到的人，却成为“父亲”建设藏地草原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全知视角中，他们协同促成了“雪山大地”的时代巨变。正如“父亲”所言：“所有偶然都带着命中注定的意味，缘分在它一出现时就带着无法回避和不可违拗的力量。”^{[20](4)}可以说，新时代乡土小说通过外来者的限知视角与叙事者的全知视角的流动，微观与宏观融汇，全面反映了“山乡巨变”是个人偶然性与时代必然性的结合。另一方面，外来者与乡村青年的视角相互结合，融入叙事者的全知视角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作家们从外来者视角写农村时，“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21](27)}。相较而言，新时代乡土小说更注重外来者视角与乡村青年视角的双向互动，突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内生动力。如，老藤的《战国红》以乡村青年杏儿的视角，向扶贫干部陈放讲述禁锢柳城百余年的“喇嘛咒”。陈放誓要推动柳城发展，认识到驻村的任务不仅在于扶贫，还在于培养杏儿等乡村青年，发掘农村蕴含的潜在力量。小说叙事视角有意转向杏儿等青年，叙写她们处理合作社商标侵权、与秀秀公司合作以及开发生态旅游项目等，体现乡村青年的成长。同样，红日的《驻村笔记》以第一书记毛志平的视角，叙述红山村脱贫攻坚工作的点滴，其中时常穿插覃文科等年轻人视角的思考。他们意识到，通过外出打工不仅很难实现自身发展，也难以带动红山村脱贫，应当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可以说，新时代乡土小说外来者视角与乡村青年视角的互动，不但形成了叙事视角之间的相互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农村新力量的自我成长。

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视角，不仅有外来者的凝视，更有来自农村内部的注视。一些新时代乡土小说选择以农村内部的儿童视角，观察农村苦难与新变，与叙事者的全知视角流动互通，形成表里互补的叙事效果。“十七年”文学中，马烽的《韩梅梅》、浩然的《水生》和胡奇的《镰刀弯弯》等，多以儿童视角描写农村生产劳动。新时代乡土小说，同样以儿童视角表现沉重现实。如，纪红建的《家住武陵源》以花儿的视角，诉说个体家庭因病致贫的无力。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以阿鼎的视角，展现边地民族的贫困生活。但与《水生》等小说不同的是，新时代乡土小说以童稚视角反映民生艰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叙事者全知视角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儿童视角“它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更为隐蔽的介入方式而已，本质上也是经过作者选择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修辞方式而已”^{[22](176)}。在《红尘

慈悲》中,作者次仁罗布放任云丹肆意想象城乡生活,借她的视角反思为何人辛勤劳作却还是贫困。章泥在《迎风山上的告别》中从残障儿童陈又木的视角看待现实农村的变化,看似漫无边际的书写,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如何维护残障人士尊严的思考。同样如此的,还有胡永红的《上学谣》和谢长华的《驭蜂少年》等。可以说,书写儿童艰苦经历的背后,是作者期待农村改变的意愿。儿童限知视角感性的生活叙事,与叙事者全知视角的理性讲述表里互补,形成了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特殊艺术感染力。

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视角流动,是文学发展逻辑、社会主体选择与作家创作观念等多重关系作用的结果。叙事视角具有“表现独特的世界感觉,蕴含某种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19](268)}的作用,对叙事视角的探索贯穿中国现当代小说,尤其在乡土小说中体现明显。需要反思的是,部分乡土小说的“叙述视角上总是睽违于乡村与农民的本位”^[23],以“他者”的眼光打量农村,参与农村变革的实践主体及其心理变化得不到普遍关注,以致农村发展的呈现维度较为单一。新时代“山乡巨变”是全社会共同行动,其“新”不只在时代语境,还在于社会主体的精神变化。无论是驻村帮扶的农村外来者,还是切身体验乡土变革的青年儿童等农村内部者,不同社会主体的精神状态都表现出新动向,需要多元叙事视角交织才能呈现。此外,叙事视角的选用,还与作家的创作观念密切相关。作家们重视参与乡土变革的个体经历,以多视角表现不同个体的独特感觉。如,杨志军直言《雪山大地》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很大的意义”^[24]。红日在《驻村笔记》的创作谈中说道:“每个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干部和帮扶对象都可以从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25](66)}因此,作家们以全知视角总体叙述农村发展方向,以个体的限知视角,尤其是代表农村发展未来的青年与儿童的视角,呈现不同叙述者主体的变化,意图多维度呈现主体新变,多角度察觉山乡新变。

显然,新时代乡土小说接续新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流动视角,让农村内部世界与外部社会结合起来。作家们选择以外来者视角或者儿童视角进入农村内部,通过叙事视角的流动勾连农村的内外世界,反映了农村建设不仅有源自国家行动的力量,还有来自农村的内部动力,如此形成了内外兼顾讲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叙事视角。

三、诗意乡愁的叙事氛围

有研究者认为,“‘乡愁’,生动地传递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情状、生存图景及情感结构,也在美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形象塑造,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美学视角之一”^[26]。步入新时代,乡愁扎根的土壤发生了改变,乡愁的叙事风格也因之改变。新时代乡土小说诗意描绘新时代风俗画和风景画,营造具有中国“新乡愁”意味的叙事氛围。“新乡愁”已不再徘徊于对旧日乌托邦的怀恋,更多着力于推动乡村新改变的行动。

新时代乡土小说中具有乡愁意味的叙事氛围,源自作家们“胸膛贴近乡土”的写作姿态,发现乡村生产生活的新图景。一方面,部分作家类似柳青等人,具备作家与下乡干部的双重身份,参与地方脱贫攻坚全过程。如,红日、李约热、杨恩智等作为第一书记,都有数年驻村经历。另一方面,一些作家虽未亲身经历乡村建设,但深入新时代文学现场,注重实际体验。如,乔叶常年“跑村”“泡村”,为创作《宝水》积累经验。沈念用一年半时间,实地走访上百个村庄,完成了《天总会亮》等小说。作家们力求“身到”“心到”“情到”,将真切的乡村生活体验融入文本,获得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鲜活经验。由此,作家们发现曾经在中国文学中落寞的乡土已旧貌换新颜,新的乡愁已不仅是对旧日乌托邦的怀恋,更是对当下成就与理想愿景的思索。

首先,新时代乡土小说的乡愁叙事体现为风俗画的诗意勾勒,呈现文化底蕴浓厚且富有生机的新时代乡村。唐弢认为,“民族风格的第一个特点是风俗画——作品所反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27][28]}。新时代乡土小说通过对乡村风俗画的巧妙着墨,表现中国乡土的文化意蕴。如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既展现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尔邦节,也记录里下河民间小调,凸显回汉聚居地域的文化风情。需要注意的是,风俗画的作用并非仅仅保留过去生活的印象,也可转化为走向新生活的力量。如在王松的《暖夏》中,“梅姑彩画”获得非遗技艺资助,以民间文化资源助推村民脱贫;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注重文化扶贫,实施“楷坡记忆”工程,拓展了楷坡镇的发展道路。新时代乡土小说的风俗画描写,不仅“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习俗技艺等融入叙事,使作品多了一层文化意蕴”^[28],还融入了乡村旧日传统、当下成就与未来希望,体现了乡愁叙事的新特色。

其次,新时代乡土小说的乡愁叙事体现为风景画的诗意描绘,呈现生态和谐之美。“人与某类风景之间能否建立审美关系,往往存在感官享受与认知的差异。”^[29]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作品中的风景常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把回到原始自然视为风景描写的格调,二是把城市风景作为风景画的新风格。新时代乡土小说则将自然风景与现代风景结合,呈现建设乡村新生态的诗意色彩。如,《深山松涛》中闭塞落魄的太阳村,在作家罗涌的笔下,因夏天的黄花、秋天的池鱼和冬天的白雪,具有了自然诗意。小说还描写了因现代化种植遍及全村的黄连、辣椒和莼菜等,让读者感叹贫瘠土地因脱贫而新生的风景;王霜的《枣花开蜜更甜》中,既有辽阔的金黄麦田和奔流的滹沱河水等自然风景,也有建设枣树湾生态农业区的现代风景。丁帆曾提出乡土文学的“三画四彩”说,认为风俗风景具有自然、神性、流寓、悲情等四种色彩,乡愁的形成与此四种色彩密切关联。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风俗风景不仅如此,更具有农村因脱贫而生的欢愉色彩。这是新时代乡土小说赋予乡土中国的新色彩,“愁中带喜”也可以看作乡土文学中乡愁情感的新转向。

再次,诗意乡愁呼唤入城青年回嵌乡土,构造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青年力量。随着“城乡中国”转型,贾平凹的《秦腔》、孙惠芬的《上塘书》和梁鸿的“梁庄系列”等,多以乡愁“告别正在消逝的‘村庄’”^[30]。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视为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31],乡愁产生于人们不满农村现状且难以融入城市的窘境,是一种在追求现代生活中疗愈创伤的情绪。长期以来,一些作家多关注有关现代化阵痛式的乡愁,常在“乡衰”和“城困”的双重困境中挣扎,即使如迟子建等以“农民进城”后的和谐生活展现城乡温情,也难以从根本上冲散“乡衰”带来的愁绪。新时代以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些青年主动返乡,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力量。新时代乡土小说以返乡青年的创业实践,把乡愁的情感力量转化为建设乡村的行动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返乡’书写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呈现故乡的现状,而在于‘返乡’的行动体现知行合一的精神”^[32]。如在《特别的归乡者》中,返乡青年企业家陈飞黄为家乡修建生态鱼塘,组织养殖技术培训等,发现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比自己在城中创业更有成就感。《暖夏》中的青年二泉,返乡后与主任联合推广特色农产品,成立养殖合作社。青年返乡创业的背后,是在乡愁驱动下对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一片热忱。正如《繁花似锦》中的返乡青年周铁铁所说:“对这片土地我们已经倾注了深厚的情感,真是爱得深沉。”^{[33][207]}新时代乡土小说书写青年返土归乡,体现了返乡书写的新变,由过去“离乡—入城—返乡—入城”的情节链条,转变为“离乡—入城—返乡—建乡”;乡愁意义的建构也发生了新变,由怀恋传统的“旧乡愁”转变为期冀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乡愁”。这既展现了乡土文学中城乡融合的书写趋势,也反映了乡村青年在新时代的道路选择。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塑造了一大批怀揣“乡愁”远离故土跻身城市寻求个体价值的乡村进城青年,而新时代乡土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实现个体价值的离城返乡“新青年”,他们已然成为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力量。

“乡愁美学是对乡愁的审美观照,是从内心中对家园感的追寻和探究。”^[34]新时代乡土小说对乡

愁诗意的新书写, 不仅渲染了具有温情的叙事氛围, 更重要的是淡化了乡愁的感伤情绪, 蕴含了建设中国乡村新家园的美好憧憬, 成为理解新时代乡土文学的重要叙事风格。

四、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的叙事探索

何向阳认为, “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应在新时代乡村书写的文学创作中有大的突破。”^[35]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书写中国农村新故事, 是新时代文学关注的重点。但如何写好农村新故事, 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新时代乡土小说通过具有中国风格的叙事方式, 开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实践, 为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提供了有益探索。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迫切需要作家们具有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的叙事能力。陈晓明、丁帆、刘大先和李云雷等学者, 曾就此问题展开集中讨论。概要来看, 学界认为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既需要持续关注“山乡巨变”中的“变”与“不变”, 还需要文学人民性和文化现代性等统摄。“虽然新时代乡村涌现出了诸多新的现象, 但是如何捕捉时代的最重要主题, 如何将众多生活现象整合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结构, 如何将乡村故事讲述为具有整体性、普遍性, 并且和每个中国人都相关的中国故事, 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需要我们去探索。”^[36]就方法论而言, 此问题不仅需要思考中国农村新故事“写什么”, 更需要思考中国农村新故事“怎么写”。因“怎么写”而引发的关于叙事风格的思考, 正是新时代文学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新时期以来, 乡土小说扎根于中国文学的叙事经验, 随着乡土中国的变化更新创作风格。但也有部分乡土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偏重于叙事技术的实验而难以真切书写现实中国。新时代乡土小说, “从不同的侧面与维度表现了对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发展”^[37], 表现出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叙事方法的创作趋向, 具体体现在时间、空间、伦理和互文等多方面探索叙事的中国特色, 着力为中国农村新故事该“怎么写”寻找路径。

第一, 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表明, 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要建构体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叙事时间。中国故事是体现中华民族命运的故事,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呢, 根本问题是怎样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 怎样讲述这个完整的故事”^[38]。为写好古典中国农村到现代中国农村的新变革, 新时代乡土小说在“中国套盒”式的故事层套中交织多种叙事时间, 关注彰显时代新进程的历史记忆。如, 熊育群的《金墟》在司徒誉重建赤坎古镇中, 追溯出百年前司徒家族与关氏家族修建古镇的传奇故事, 显示了振兴侨乡的新时代意义; 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将俄洛村的脱贫历程置于革命历史记忆中, 既反映了多年前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民族兄弟情, 又演绎了新“长征路上”的民族一家亲; 陈应松的《天露湾》诉说天露湾村的葡萄种植记忆, 从金满仓穷则思变引植葡萄, 到金甜甜打造现代葡萄产业园, 一路艰辛影射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勤劳致富的开拓精神。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就是书写关乎民族文化、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等的伟大探索。南帆认为, “记”“忆”的侧重点不同, 历史话语注重“记”, 倾向客观精确; 文学话语注重“忆”, 倾向个体情感。要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 呈现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历史新转折, 就需要处理好文学、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将具有情感属性的“忆”嵌入属于历史话语的“记”, 把中国乡村的今昔对比放置于体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叙事时间中, 进而展现山乡新变的壮美画卷。

第二, 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表明, 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要构造能折射中国社会总体性的叙事空间。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 作家们几乎“都将乡村和乡村的合作化运动置放于国家‘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加以叙述, 或者说, 所谓‘地方’事实上已被纳入国家现代性的想象愿景之中”^{[39](50)}。

但20世纪末以来,部分作家致力于建构属于传统“乡土中国”的文学村庄,“乡村经验已经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验脱钩”^[40]。新时代乡土小说以内外流动的叙事视角,有效衔接农村的内外空间,将中国农村“为何”以及“如何”发生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宏大命题,聚焦到某一具体村庄,将乡村经验重新上升到中国经验。如在王存华的《向阳而生》中,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展现了黄龙湾村在黄河滩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穿插其中的农村外来者限知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黄龙湾村生态污染,以及为此做出的改变努力。小说以黄龙湾村的变革,辐射整个黄河滩区从生态恶化到河畅水清的转变。郭菲的《寻找支格阿尔》在第一书记孔文瀚的限知视角和水落阿信等青年视角的互动中,通过格洛村的脱贫发展反映中国社会多年来取得的成就。马慧娟的《飞起来的村庄》将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与阿里的儿童视角结合,观察西海固老虎沟村移民搬迁时的艰难不易,折射新时代“山乡巨变”中的坎坷过程。可见,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深思的重要问题,要借“地方”现实看到“国家”发展的必要性、持续性与挑战性,“以一幅饱含情感的村庄生灵图腾献礼新时代,为平静日常注入生活百味,直指中国美学的高远境界”^[41],促使“地方性叙述”产生“普遍性”的重要意义。

第三,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表明,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要具有回到中国农村现场的叙事伦理。叙事伦理重在强调作家如何采用“生活经验”^[42]。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特定的美学风貌,但也产生了知识分子视角的创作局限。“很多作家至今仍固守乡土文学的惯性审美,对于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跟现实乡村的具体情况存在巨大隔膜。”^[43]若要改变这一局限,发扬柳青等人扎根乡村生活的实践精神,是必不可少路径。新时代乡土小说以回到农村现场的叙事伦理,深入体察中国农村的新变。如,杨遥多次到山西农村采访,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勾连自身亲历的扶贫历程,为创作《大地》积累素材。幼时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陈毅达,将四十年的扶贫真实感悟融入《海边春秋》,写出了鲜活的返乡新青年群像。此外,刘庆邦、范稳、关仁山、马金莲等作家都有深入农村生活的经历。无疑,只要作家能回到中国农村现场,触摸农村现实图景,感受农民内心冷暖,成为“山乡巨变”的真实体验者,作家笔下就会涌现中国农村新故事的鲜活叙写。

第四,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表明,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要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观念。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诗意乡愁,不仅源于立足中国农村现场的叙事场景,还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指向。边地农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曾经寻根文学对边地农村的发掘,发现了主流叙述遗忘的隐秘角落,但部分作品也因单向度的族群历史书写,造就了孤芳自赏的封闭空间。究其原因,此类书写多注重边地农村的地方文化,对边地农村如何改变缺乏深入思考。新时代乡土小说不仅以边地农村的独特文化“重绘文学地图”,更注重通过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话,在“重建边地农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家们意识到,不能仅仅哀悼民族传统在现代的困境,还应看到乡村建设对民族生活、民族文化与民族观念等传统的重建。如,在吕翼的《竹笋出林》一书中,既有彝族同胞易地搬迁离开传统家园的哭诉,也有新家园新生活带来的喜悦;韩静慧在《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中,关注擀毡子等蒙古族民族技艺如何实现现代转化;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以塔玛公社汉藏四代人的经历,折射西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映射西藏各民族思想观念的新生。可以说,新时代乡土小说没有为边地农村“造魅”或“祛魅”,而是着力体现边地农村的新活力,体现中国边地与中心地区同频共振的巨大变革。如此叙事方式,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表明,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还要注重叙事的互文性。书写中国农村新故事,既关联作家对中国农村现实的认识,也关涉小说文本表达的技巧问题,这是对文学思想与叙事方法的双重挑战。为此,新时代乡土小说不仅将“历史叙事与乡村脱贫的现实书写构成互文性结构”^[44],还注重与中国文学资源对话,在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形成叙事的互文性。就小说内容的互

文性而言,“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形成了互文、对话关系”^[45],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刘继明的《人境》多次提及《创业史》。另外,老藤的《草木志》化用《离骚》中的香草,温燕霞的《琵琶围》化用电影《闪闪的红星》。就小说结构的互文性而言,新时代乡土小说在“中国套盒”的叙事结构中,融合采用“跨层表达”“跨体书写”“互涵交迭”等叙事方法,强调化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更新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铁凝认为,“当作家艺术家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民族世代相承、同时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之中,他就是一个永远携带着故乡的人……他的根本责任就在于使这伟大的传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不断向着新的天地、新的境界伸展”^[46]。新时代乡土小说汲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资源,传承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能激发作家们立足中国文学经验开展创新,探索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的叙事方法。

毋庸讳言,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探索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部分作品没有处理好时代主题与创作主题的关系,“没有平衡好时代话语和艺术审美的关系”^[47];叙事内容模式化,外来者形象理念化、扁平化较为明显,历经艰险助推农村发展,似乎已成为小说固定套路,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叙事方法同质化,多以农村外来者的视点书写,除农村儿童视角外,少有内置的农村视点,难免会造成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疏离。可以说,新时代乡土小说收获了有益的叙事探索,但其不足也为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提供了前车之鉴。

五、结语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乡土社会步入了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新时代乡土小说之“新”,不仅在于叙事主题之“新”,还在于叙事风格之“新”。作家们肩负新的文化使命,传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展现出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中国风格。这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为写好中国农村新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方案,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动向。随着时代演变及文学发展,乡土小说无疑还会出现新的叙事风格。当前,阶段性反思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创作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探赜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当代更新,深入思考如何建构新时代文学的中国风格。

注释:

- ① 如李震在《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中认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新的文化裂变,既有的乡村叙事传统已难以为继,部分乡土作家已陷入力不从心的困境。王尧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提出,在乡土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以往乡土文学的经验遭到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乡土。

参考文献:

- [1] 张宏森. 以“当代之笔”赓续中华文脉[N]. 人民日报, 2023-07-04(20).
[2] 张丽军. 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J]. 中国文学批评, 2022(4): 11-20, 187.
[3] 张艳梅. 乡土叙事面临的困境与突破路径[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5): 11-17.
[4] 秦雅萌. 赓续历史文脉,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讨会综述[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3(10): 1-12.
[5] 蔡仪. 美学原理提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6] 铁凝. 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N]. 文艺报, 2020-07-20(1).

- [7] 李遇春. 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J]. 天津社会科学, 2022(5): 97-109, 115.
- [8]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9]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10] 张柠. 论叙事作品形态与东方套盒结构[J]. 文艺研究, 2022(7): 5-15.
- [11] 乔叶. 关于《宝水》的若干话题[J]. 小说评论, 2023(5): 83-85.
- [12] 杨庆祥. 当返乡者不再离开: 评乔叶《宝水》[J]. 中国文学批评, 2023(3): 66-70, 190.
- [13]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 [14]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5]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6] 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7] 陈晓明. 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百年中国文学开端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J]. 文艺争鸣, 2021(7): 6-14.
- [18] 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9] 逢增玉. 文学现象与文学史风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1.
- [20] 杨志军. 雪山大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2.
- [21] 黄秋耘. 琐谈与断想[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
- [22] 李建军. 小说修辞研究[M]. 修订本.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9.
- [23] 雷鸣. 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J]. 河北学刊, 2024, 44(2): 131-140.
- [24] 张嘉. 杨志军: 人要有“翅膀”, 才可能破土而出[N]. 北京青年报, 2023-03-07(B1).
- [25] 少数民族作家: 文学沃野, 骏马奔腾: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谈[M]// 刘跃进. 中国文学年鉴. 北京: 中国文学年鉴社, 2021.
- [26] 杨吉华. “乡愁”的审美表达与“中国”历史流变的文学书写[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6): 141-148.
- [27] 唐弢.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28] 吴义勤. 新时代乡土文学: 展现山乡巨变, 彰显奋斗创造[N]. 人民日报, 2022-06-17(20).
- [29] 金春平. “风景”抒写中人文精神与智性经验的构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4): 166-173.
- [30] 李震. 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80-99, 205-206.
- [31] 张继红, 雷达. 世纪转型: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雷达访谈录[J]. 文艺争鸣, 2015(12): 58-63.
- [32] 张洪艳, 逢增玉. “情动机制”: 21世纪文学中的“返乡”书写[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5): 4-10.
- [33] 张艳荣. 繁花似锦[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0.
- [34] 范玉刚. 乡村文化复兴视野中的乡愁美学生成[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1): 12-19.
- [35] 何向阳. 推出新时代文学的“压舱”之作[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12-09(A5).
- [36] 李云雷. 新时代乡村书写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J]. 中国文学批评, 2022(4): 4-10, 187.
- [37] 刘艳. 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 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8(5): 42-50.
- [38] 李云雷. 《白鹿原》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6): 57-67.
- [39] 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40] 刘文祥. 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4): 180-188.
- [41] 晏杰雄, 丁思存. 新乡土叙事: 回归生命本体的民族寓言: 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综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1): 168-178.
- [42] 王鹏程. 从“城乡中国”到“城镇中国”: 新世纪城乡书写的叙事伦理与美学经验[J]. 文学评论, 2018(5): 212-221.
- [43] 王磊光. 共同体转向: 百年乡土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村主题写作”[J]. 探索与争鸣, 2022(12): 163-172, 213.
- [44] 廖志华, 颜敏. 论新世纪乡村长篇小说的叙事策略[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10): 44-50.
- [45] 王仁宝. 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J]. 文学评论, 2024(3): 140-149.
- [46] 铁凝. 让中国精神的灯火在新时代的文艺高峰上闪亮[J]. 求是, 2022(16): 61-65.
- [47] 张凡. 新时代乡村小说的特征与风貌[J]. 中国文学批评, 2022(4): 21-27, 187.

The Chinese style of writing local novel about “great changes in mountain areas” of the new era

YANG Jianjun, CUI 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novel of the new-era literature reflect th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the attention to its narrative style in the academia is not enough. By combing the developing evolvement of the local novel of the new era, and analyzing the Chinese style of such novel narra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hinese style for the local novel of the new era to write about “great changes in mountain areas” is manifested in integrating “cross-narrative layer expression” “cross-style writing” and “interrelated and overlapping” into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box”, in combining the limited perspective of the rural outsiders and others with the omniscient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or to form , and in creating the nostalgic narrative atmosphere in the poetic depiction of genre and landscape paintings. The Chinese style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local novel in the new era can inspire us to ponder over how to write new rural stories from the aspects of narrative time, space, ethics, concepts and intertextuality, and promote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to the “peak”.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the local novel; narrative style;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mountain areas; Chinese stories

[编辑: 陈一奔]

(上接第 207 页)

How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ssay becomes a possibility: Take Li Subo's *Research on Essays* as an example

HUANG Ke'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Li Subo's *Research on Essays*, although containing elements of “compiling”, is not simply a list of materials, but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ompiling” and “writing” to achieve academic breakthrough, hence being a valuabl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work on essays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Li Subo, sta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conducts micro exploration and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of essays, an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and integrating various viewpoints, further deepens and sublimates the thinking of various academic issues, thus extracting academic viewpoints with shining points, achieving a leap from empirical description t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forming a highly dynamic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It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global vision and absorption of traditional nutrients, and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the fusion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effects generated by this work still need to be fully affirmed. This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today.

Key words: Li Subo; compiling and writ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编辑: 陈一奔]